



六零學人文集

陳 致 著

詩書禮樂中的傳統

陳致自選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六零學人文集

陳 致 著

詩書禮樂中的傳統

陳致自選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 I P) 數據

詩書禮樂中的傳統:陳致自選集/陳致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六零學人文集)
ISBN 978 -7 -208 -11013 -7

I. ①詩… II. ①陳… III. ①文史—中國—文集
IV. ①C52 -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229970 號

特約策劃 黃曙輝
責任編輯 周 珍
裝幀設計 王小陽

· 六零學人文集 ·

詩書禮樂中的傳統

——陳致自選集

陳 致 著

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世紀出版集團發行中心發行

上海商務聯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20 × 1000 1/16 印張 27.25 插頁 4 字數 467,000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7 -208 -11013 -7/K · 1932

定價 66.00 元

编辑则例

1. 六零学人文集入选出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人文科学研究者的自选集。
2. 作者自选的学术论文和学术批评结集,文责自负。
3. 入选文集经学者推荐、匿名评议产生。
4. 入选学者来自考古学、艺术史、科技史、文献学等领域,本丛书将向其他人文学科开放。
5. 本丛书不设主编,由作者自序,不强求体例统一。
6. 本丛书提倡学术的自主性、严肃性、多样性。

自序

本書是我近年來在不同學術期刊上所發表的十五篇論文的合集。這些年來，筆者的主要興趣都集中在詩書、禮樂和古史方面。現在回過頭來看，主要是圍繞著《詩經》向四周和前後延伸，結合音樂考古資料、古文字學的知識，特別是甲骨文、金文和簡帛文字，以及明清的科舉制度、學術思想等等方面展開研究。

文集集中的前三篇文章主要研究金文、簡帛文字與《詩經》中的習用語詞，分析這些語詞在先秦語言文化中的來源、發展，以及二者之間的關係。第一篇《從〈周頌〉與金文中成語的運用來看古歌詩之用韻及四言詩體的形成》首次發表於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及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辦之《傑出學人講席：跨學科視野下的詩經研究》（2009年4月1日），該文在國際學界首次提出：一，從兩周金文來看，銘文的入韻和四言化是在西周中期，特別是恭王（922—900 B. C.）、懿王（899—892 B. C.）時期；二，兩周金文中與《詩經》之《雅》《頌》部分的詩歌語詞多相重合，這些多源於周人習用祭祀語詞，而非金文引詩；三，故中國四言詩體的發展成熟時期是與周代貴族的祭祀生活密切相關，而其成熟時期很可能在西周中期；四，這與周代雅樂在西周中期的成熟與標準化密切相關，如樂鐘雙音的使用以及四聲音階在禮樂中的主導地位等等。故本文對西周金文以及《詩經·周頌》間相似相合的章句作一全面的考察，這種考察不僅僅是簡單、機械地對讀，找出相同或相似的句式，而是在很多情況下文字不同，但實際上是出自相同的成語，由聲音的轉借及字形的訛衍而造成的語詞的分化。由此，對《詩經·周頌》詩篇的創作或改定入禮樂，編入《詩經》的年代亦作一合理之推測。

第二篇文章《詩經與金文中成語（一）》，^①以金文蔡侯鐘之“不侃不忒”，弔夜鼎

① 陳致：《詩經與金文中成語（一）》，始發表於2009年1月17日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主辦之《古道照顏色：先秦兩漢古籍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刊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頁。

銘之“用侃用享”與《詩·魯頌·閟宮》中“無貳無虞”《詩·商頌·烈祖》有“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來假來饗，降福無疆。”《詩·周頌·絲衣》之“不吳不敖”等互讀，發現是由同一成語衍生出來的不同變化形式。

總而言之，筆者通過對金文韻語與《周頌》諸篇的考察，認為四言成語的大量出現、四言體詩的形成，都應在西周中晚期，共王、懿王時期以後。而這一現象並非偶然，與音樂的發展和周代禮樂中雙音鐘的規範使用，四聲音階在禮樂中的定型等都有關聯。西周穆王(976—922 B.C.)時期是規律性雙音鐘出現的起點，從此以後，西周編甬鐘的正側鼓音呈現了規律化的小三度音程關係。在音樂上使用四聲音階與西周祭祀語言四言化有直接關係，而祭祀語詞的四言化又直接導致四言詩體的形成。經仔細考察，筆者發現：與音樂的發展相對應，西周青銅器銘文也經歷了由雜言向四言，由無韻到入韻的變化。

第三篇文章《“日居月諸”與“日就月將”：早期四言詩與祭祀禮辭釋例》，首次發表於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與孫少文伉儷人文中國研究所2010年12月聯合主辦的“中國詩歌傳統與文本研究”國際論壇(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oetic Legacy and Textual Studies in Pre-modern China)。以往我研究金文與《詩經》中的成語，主要著重《詩經》中的雅頌部分與金文的文本互涉研究上，但本文則試圖，由金文祭祀禮辭中常用的成語，觀其在國風部分及其他文獻資料中的演變，借以觀察在少數貴族群體中流行的歌詩和成語如何在數百年間流傳到更寬廣的社會人群當中；而在流傳過程中，又是如何出現更多相關的成語。“日就月將”與“日居月諸”在不同時期、不同詞義的分化、衍生，及其轉換成新的成語及四言詩句是本文的考察重點，由此可以稍窺早期四言詩中祭祀禮辭及其與一般詩句中的流轉層疊變化之跡。

第四篇文章討論的是清代學術中《詩經》的文本異文研究的興起和發展。清代學者的《詩經》研究，在《詩經》學術史上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是傳統《詩經》學向近代《詩經》轉換的關鍵時代。無論從《詩經》學研究的廣度、深度、數量和質量來說，其成就都可以說是超軼前朝的。《詩經》異文產生自先秦時期，兩漢以降，益增以繁。然異文的輯佚與考釋，至清初始受重視，乾嘉時期彬彬斯盛。本文考察《詩經》異文考釋在清代興盛的原因，並以《大雅·文王之什》為例，探討清初至乾嘉時期《詩經》異文考釋的特點、研究方法和成績。其中尤以李富孫的《詩經異文釋》為重點。本文描繪了清代《詩經》異文考釋學之概觀，雖不夠全面，但基本上也是前人沒有做的工作。

關於晚清的《詩經》學，本集中的第五篇文章，《商略古今，折衷漢宋：王先謙的

今文詩學》^①對王先謙的經學方法和成就，包括其《詩三家義集疏》作了一些介紹和研究，並且試圖澄清一些晚清《詩經》學中，今古文文本與漢宋學方法之爭的問題。以往的研究多強調王先謙的今文詩學。本文一方面指出王先謙在理論上的尊今抑古和推尊宋學，另一方面又指出在其實際操作中往往是折衷今古學，而所謂推尊宋學，亦每只推尊宋學中的考據訓詁，即宋學中的漢學而已。本文還提出了一個觀點，認為我們自清代以來的經學研究，往往在今古文學派和漢學宋學等概念上纏雜不清，其主要原因是沒有分清楚，所謂“今文”“古文”是文本的不同，而“漢學”“宋學”是學術旨趣和學術方法取徑之異。以清代中期以後的《詩經》學為例，今文三家詩的文本越來越受到學者的重視，但是在對待三家詩的文本，學者或重視輯佚，或重視考其異文，或以三家詩之遺說考其遺義，這些是“漢學”考據的方法。故不存在“今文”與“漢學”對立的問題。討論經學史的學者往往混淆這些概念。

第六篇文章《殷人鳥崇拜研究》原本為發表於德國《華裔學志》上的“A Study of the Bird Cult of the Shang People”^②一文，本文以經典文獻與考古古文字資料相結合考察了殷人鳥崇拜是否屬於所謂圖騰信仰的問題，並且指出商人以鳥為圖騰的說法源於西方19世紀下半葉人類學中興起的圖騰信仰理論，而這一理論自20世紀中葉已經證明並不適用，也就是說人類早期在宗教產生以前，並未經歷一個普遍的圖騰信仰階段。從《詩經》的相關篇章入手，探討殷人的所謂玄鳥圖騰崇拜問題。結合神話資料、考古資料和古文字資料，本文探討了所謂殷人以玄鳥為圖騰的說法的理據、玄鳥形象的來源，以及圖騰研究的適用範圍等，證明殷人的鳥崇拜事實上是針對猛禽類鳥的神性的崇拜。該文章經華東師範大學尚飛先生翻譯後，收入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人文東方：旅外中國學者研究論集》一書。

原發表在《人文中國》（第9期，香港：浸會大學，2002年，頁229—252）的《原孝》一文，探討了孝、老、考、丌諸字的來源，認為孝字本義類享，是指以酒食奉養父母。通過將《詩·小雅·楚茨》與《禮記·郊特牲》、《儀禮·少牢饋食禮》以及金文中所見西周孝享之禮的比照研究，文章試圖勾勒出一個早期的孝享活動基本儀文制度和禮節。其結論是孝之本義始於事生，然後擴而為事死。其初或為簡單的醴餼之獻，而其後事死之禮逾隆，終於與祭天地神祇之禮並重。於是乎隨着時代的發展而產

① 陳致：《商略古今，折衷漢宋：王先謙的今文詩學》，《湖南大學學報》第20卷第70期（2006年1月），頁31—43。收入朱漢民主編《清代湘學研究》，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6，頁219—250。

② Chen Zhi, “A Study of the Bird Cult of the Shang People,” *Monumenta Serica* 47(1999):127—147.

生。一個日常生活中的孝，擴而為宗教行為，又進而賦予豐富的倫理內涵。

第八篇《清華簡所見古飲至禮及〈鄧夜〉中古佚詩試解》^①一文是根據新發現的清華簡《鄧夜》篇中的古佚詩研判其與詩經的關係，根據其用韻、語詞等考訂其成詩的時代。本文初稿為英文，最初應芝加哥大學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教授及台灣“中研院”文哲所范麗梅女史之邀請，在芝大東亞系首次發表。^②此後，應沈建華教授之邀約，在將本稿翻譯成中文的同時，又做了大量增訂。稿成後，應日本早稻田大學稻畑耕一郎教授之邀請，在早大又作了一次報告，早大的古屋弘昭教授又提出了一些意見。2009年8月4日，李學勤先生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清華簡〈鄧夜〉》一文，其中介紹了簡文中古佚詩數首，從李先生文章中公佈的古佚詩內容來看，風格頗似今本《詩經》中的《小雅》類與飲酒有關的作品，本文謹根據李文中所公佈的古佚詩的內容作一解讀。

本文分“耆者”、“飲至禮”、“作策(冊)逸與監飲酒”以及“清華簡中所見四首詩”等四個部分對清華簡中“耆夜”一篇作解讀，其中“耆夜”中古詩四首，除第一首是《唐風·蟋蟀》以外，其餘三首皆不見於今本《詩經》，顯然是古佚詩。三首中有武王為畢公作的《樂樂旨酒》，有周公為畢公作的一首，也有周公為武王作的《明明上帝》。本文認為如果從這幾首詩的句式（基本上是每行四字）、用韻和套語的使用這幾個方面來看，我認為這幾首詩不太可能是商周之際的原來的作品，即使與原來的作品有一定的關係，也是經過了改寫和加工。

第九篇《萬舞與庸奏：商代祭祀樂舞與詩經中的頌》，^③第十篇《二南：南方的樂鐘與雅音》，^④第十一篇《說夏與雅：宗周禮樂形成與變遷的民族音樂學考察》，^⑤係我博士論文《從禮儀化到世俗化：詩經的形成》的一部分。論文的英文版經改訂後，2007年由德國華裔學志出版；中文版則於200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而三篇文章主要雖從書稿中來，但也做了很多的增改。總的來說，從《詩經》的文本出發，結合民

① 原刊於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第1輯(2010年)，頁1—30。

② 見Chen Zhi, “The Rite of Yinshi (Drinking Celebration) and Poems Recorded on the Tsinghua Bamboo Slips”(清華簡中所見古飲至禮及古佚詩試解),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xcavated Manuscript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ook of Odes,” September 12—13, 2009.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aper available at the following webpage: <http://cccp.uchicago.edu/2009BookOfOdesSymposium/>.

③ 原刊於《中華文史論叢》2008年第4期，頁23—47。

④ 原刊於《國學研究》第13卷(2004)，頁1—39。

⑤ 原刊於台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19卷(2001年3月)，頁1—53。

族音樂學、考古學及古文字學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以探討《詩經》文本的形成，並進一步挖掘其文字背後所蘊藏的關於商周時期的歷史文化進程。

我們知道，《詩經》由風、雅、頌、南四類所組成。然而這個分類到底根據什麼原則來劃分？或南、風、雅、頌四類分別指的是什麼？長期以來，《詩經》學者們均嘗試對此一問題作出不同的解釋，然迄今仍衆說紛紜，莫衷一是。我認為宋代學者所提出的樂式分類理論，較漢儒諸說更為可取。進一步追本溯源，這些樂式其實源於不同的樂器。“南”字從字源來看，即竹木製打擊樂器，為南方樂鐘的代稱，進而代表具有南方色彩的樂器和樂式；“風”最初為普通管弦樂器的代稱，後來成為具有民間和地方色彩的音樂體式的代稱；“頌”源自商代的樂鐘“庸”。庸本是殷商貴族用於祭祀、饗宴所用之樂鐘，進而代表商人的音樂體式。周人滅商以後，對於商人的禮樂採取既學習，又抵斥的態度，以標榜其自身文化的優越性和獨立性。“頌”是周人創制用來取代“庸”的禮樂體式。而“雅”即“夏”，是指周人的文化與音樂，亦可指稱源自關中地區的周人所習用的甬鐘和鈕鐘，雅樂的創制與周人以夏自居的傳統亦有關係。由此可見，《詩經》的編者在分類編排時，除了根據不同的音樂體式，同時也考慮了地域的因素。

這幾篇文章中提出的一個新的角度，從音樂考古資料和古文字資料，來考察《詩經》的來源和文本形成過程。我認為商周的音樂文化存在着鮮明的地方性和民族性差異。大抵而言，商的音樂文化（以“頌”為代表）原本比周的音樂文化（以雅樂為代表）發展水平較高，周人武力征服殷商以後，其音樂文化並非簡單地直線發展，相反地是在兩種文化交織整合的過程當中，呈現出階段性的倒退。簡單來說，就整體的音樂水準而言，無論是樂器的使用、樂制樂式、對樂理樂律的認識等方面，周人的雅樂都未能在短時間內超越殷人的高度，因此形成了中國音樂文化發展上的“短暫性”遲滯和倒退。

商周音樂文化的接觸碰撞和融合，大抵可以通過分析雅樂的三次發展而知其大略，我稱之為“雅樂三變”。第一次是在武王滅商以後，開始受到殷商音樂文化的影響，然而過程中包含了交流、衝突、抵制及融合，形成的時間比較長，以至於原來商人直接統治中原地區的文化發展，由於受周人禮制的規制，出現了間歇性的衰退現象。第二次變化出現在平王東遷以後，此時“夏”與“雅”的概念已由周王畿一帶擴展至中原地區，雅樂與諸夏音樂的相互影響，熔鑄出新的雅樂體制，無論是內容、樂制或樂器均趨向多元化，並從禮儀化到世俗化。最後，到了春秋中晚期，隨着周室的衰微，晚商的餘韻、各諸侯國的民間世俗之樂以及四夷之樂漸漸取代“雅”樂，

形成了所謂的“新聲”。我認為這種新聲其實並不新，因為它實際上是部分晚商音樂文化的再現；至此，音樂文化的高度才正式回復過來。

第十二篇文章《從王國維〈北伯鼎跋〉來看商周之際的一些史事》^①則利用甲、金文的資料，重新審視了詩經學史上長期的爭論的邶鄘衛的地望問題以周初三監之亂的問題，並提出了新的看法。本文認為甲骨文中所見的“北”、“北土”都不是西周初期邶國的代稱；而周初銅器中的北白（伯）、北子諸器應該與商紂王之子武庚所封之“邶”有關。王國維在《北伯鼎跋》中，因北國銅器出於河北而提出“邶即燕，鄘即魯”的重要論斷，然徵之商周史事，紂子武庚與三監據以叛之地，不當遠自燕魯求之，故陳夢家復提出“邶入於燕”的主張。本文考察王國維與陳夢家二氏所據以論斷之證據，又根據上世紀後來發現的考古與古文字資料，指出邶國始封仍在朝歌之北故殷之地，邶鄘衛之始封，應該包括武庚（王子祿父，金文中又稱紂子聖）在內都是殷商之遺民貴族，而所謂“三監”則是管叔蔡叔霍叔等監視殷遺的周人貴族。三監之亂起，三國與殷遺俱移，武庚先徙入商奄之地，復遁“入於燕”。至召公北定燕地，殷遺之叛始平，召公之子亦獲封於燕。

第十三篇《夷夏新辨》^②一文則利用金文中的資料指出西周時期的“夏”的觀念事實上與春秋文獻中的“夏”“諸夏”“華夏”其所指並不一致。西周時期的“夏”所包涵的地理概念是指周人以宗周（關中地區）為中心的活動區域，並非指中原地區。“夏”所代表文化族群觀念則是指周人與周文化。該文在刊出以後，《光明日報》學術版與《高等院校文科學術文摘》先後作了介紹與摘要轉載。

第十四篇文章《晚明子學與制義考》，^③主要考察明代隆慶、萬曆年間科舉考試中以子學入制義的風潮及其與陽明學互為影響的思想根源。本來以四書五經為考試內容，以代聖人立言為考核方式的科舉制義，在明代中晚期出現了多用釋老之言的傾向。清代學者如顧炎武認為此風氣始於隆慶二年（1568）李春芳任會試主考之後，梁章鉅認為始於萬曆五年（1578），進士楊起元始開以禪語入制義之漸。本文考察明代晚期子學與禪語入制義的傾向，並且認為此風之漸實開自嘉靖年間（1522—1566）。其中有兩個因素起了關鍵作用，一是嘉靖本人崇信道教方術，使士大夫崇接方外人士，爭撰青詞干進；一是陽明之學在嘉靖一朝為官學所接受，在學術上推揚

① 原刊於《臺大歷史學報》第31期（2003年），頁1—43。

② 原刊於《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1期，頁3—22。

③ 初刊於《諸子學刊》第1期（2007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383—420。

了合和三教的風氣。

第十五篇文章,《嘉興李氏的經學研究:從一個經學群體的出現看科舉制度對乾嘉學術轉型的影響》最初發表於台灣“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5年6月主辦的《浙江經學第一次學術會議》,將收入“中研院”文哲所編《清代浙江經學研究》文集中。這篇文章主要從清代科舉制義的內部演變,以及私學、家學、官學的互為影響等視角,重新審視從清初到乾嘉時期治學風尚的轉移,從而為漢宋學於清代的複雜關係,提出新解釋。本文以李富孫家族為研究個案,考察這由明代開始便以文學著名的家族,因時代風尚的轉移而致其子弟走上樸學道路的種種原因。文中通過分析乾隆時期科舉考試內容形式的轉移,指出漢學在乾嘉時期的科舉考試中,如何漸奪宋學之席。此既與乾隆對漢學的推崇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又與主持各地科場、書院的考官、學政,如朱珪、阮元、錢大昕等人的推動互為因果。而李氏群從如李超孫、富孫、遇孫在此風氣下,自幼便從族人李集學習經史古學,長成後又嘗分別就學於敷文、紫陽書院及詒經精舍,與漢學名家盧文弨、阮元、孫星衍等人相知。故文中認為李氏家族之所以由文學轉而走上樸學考據的漢學路途,與漢學考據學影響到科舉考試制度,有莫大的關連。

本書能够結集出版,要特別感謝上海人民出版社許仲毅主任和周珍女士,整個這一套叢書的出版,端賴他們的決斷、努力和辛勤勞動。

——陳致序於香港浸會大學

二〇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目 录

自序 ... 1

詩

從《周頌》與金文中成語的運用來看古歌詩之用韻及四言詩體的形成 ... 1

“不吳不敖”與“不侃不忒”——《詩經》與金文中成語零釋 ... 31

“日居月諸”與“日就月將”：早期四言詩與祭祀禮辭釋例——詩經與金文中成語 ... 42

清代《詩經》異文考釋研究 ... 65

商略古今，折衷漢宋——論王先謙的今文《詩》學 ... 116

禮

殷人鳥崇拜研究 ... 138

原孝 ... 159

清華簡所見古飲至禮及《郢夜》中古佚詩試解 ... 177

樂

“万（萬）舞”與“庸奏”：殷人祭祀樂舞與《詩》中三頌 ... 202

二南：南方的樂鐘與雅音 ... 222

說“夏”與“雅”：宗周禮樂形成與變遷的民族音樂學考察 ... 255

古史

從王國維《北伯鼎跋》看周初“邶入於燕”的史事 ... 294

夷夏新辨 ... 330

晚明子學與制義考 ... 354

嘉興李氏的經學研究——從一個世家經學群體的出現來看乾嘉時期的學術轉型 ... 390

從《周頌》與金文中成語的運用來看古歌 詩之用韻及四言詩體的形成*

《周頌》的年代，現代學者一般認為其三十一篇中大部分的詩篇成詩於西周早期。如向熹說：“《周頌》大體作於武成康昭四朝（1046—977 B. C.）約一百年間，是西周早期的作品，為西周統治者用於祭祀的樂歌。”^①這一說法基本代表了現代學術界一般看法，雖微有異同。西文研究著作中，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認為在《周頌》裡，有些詩歌沒有押韻，有些部分押韻，是所謂的“自由韻律體系”（Free rime system）。高氏並對《詩經》中三頌部分的用韻都作了深入的研究。^②夏含夷（Shaughnessy）在“From Liturgy to Literature: The Ritual Context of the Earliest Poems in Book of Poetry”中指出此詩未用韻的特徵、行與行之不勻稱及其他的語言特徵，都證明了傳統將此詩認定為西周早期之作的說法是正確的。^③夏含夷又推論此詩為在“禮儀進行時所吟誦”的禱祝之詞。^④日本學者松本雅明指出在《周頌》三十一篇裡，歌頌文王的有七篇，如加上《清廟》這一篇則為八篇；歌頌武王（1046—1043 B. C.）有四篇，如加上《雝》，則為五篇，歌頌成王（1042—1021 B. C.）的有三篇，后稷、康王（1020—996 B. C.）、大王各一篇。認為也是周初宗廟祭祀的作品。並且推測在祭祀活動中，有些角色扮演的類似早期戲劇表演的行為。其中有些詩是工祝的角

* 本文原刊於陳致主編：《跨學科視野下的詩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17—59。

① 向熹：《詩經詞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918。本文所用的西周紀年，以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0年）為據。報告在學術界引發了一些爭議和質疑。但本人未介入年代學之研究，對於西周諸王的年代在此以報告為依據，以便行文。

② Bernhard Karlgren, *The rimes in the Sung section of the Shi king* (Göteborg: Elanders Boktryckeri Aktiebolag, 1935).

③ Shaughnessy, *Before Confucius: Studies in the Cre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1997, 頁165—195.

④ Shaughnessy, *Before Confucius: Studies in the Cre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1997, 頁175.

色所歌誦的，有些則是神保所歌誦的。^①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推想。在松本看來，《清廟》這首詩就是神保所歌誦的。而其他各篇或為神保所歌，或為工祝所唱，其時代也是在西周初年。以上諸家都以金文為依據，對《周頌》年代作合理的推斷。

筆者在《“萬(萬)舞”與“庸奏”：殷人祭祀樂舞與〈詩〉中三頌》一文中認為商代甲骨文和《詩》、《書》、《春秋三傳》等文獻中所說萬舞和庸奏，最初都在商代祭祀中用於迎神娛神的樂舞樂歌形式。“庸”與“頌”古音同部，聲紐相近，庸本是商代樂鐘之名，甲骨文中其字形作“𠩺”，也是當時一種祭祀禮樂之名，而周人在學習商人之禮樂文化時，既採用其體式，又需標榜獨立性，故有頌這種詩歌音樂舞蹈體式。^②筆者認為：

商周嬗代之際，周人的文化及其音樂文明是落後於商的。僻處西陲的“小邦周”作為商的屬國，雖然在軍事崛起之後，東向戰勝了曾經是其宗主的“大邑商”，但是在文化上尚處於弱勢。所以在文化上周人對商的態度一方面是要學習、吸收其文化，另一方面卻是又要加以限制和改造。限制是出於畏懼，改造是為標榜自身的文明程度。正是在這樣一種心態下，商代祭祀中所用的庸奏、庸舞和萬(萬)舞，才被吸納和改造成周人的禮樂，並又加以重新命名，這也許就是所謂“周頌”的由來。^③

《周頌》裏的詩應繼承了商代在禮儀活動中作為祝禱之詞的一些元素。這些商代的詩，一般都以“庸”(=頌)作為主要的伴奏樂器。而《清廟》等篇大概便為周早期模仿商頌之作。關於《周頌》的成詩年代，筆者原來基本上也同意諸家的看法，認為《周頌》基本上成詩於周初武、成、康、昭時期。但是現在看來這一看法是基於詩歌的內容、用韻、語句特徵所作的一個表面粗疏的判斷。

近年來筆者在研讀金文和《詩經》的過程中，發現在《周頌》這部分有兩個問題值得特別關注：一個是《周頌》中的成語成詞的問題；另一個是用韻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實際上牽涉到西周早期的祭祀用語的發展變化問題。筆者認為從金文和《周頌》兩相比照來看，當時祭祀語詞經歷了由不規則向規則的方向，並且由雜言向四言固定化的過程。《周頌》中許多詞語在兩周金文中都有對應的辭例，有

① 松本雅明：《詩經諸篇の成立に關する研究》，東京：東洋文庫，1958年，頁608—625。

② Chen Zhi, *From Ritualization to secularization: The shaping of the Book of Songs*, Sankt Augustin: Monumenta Sinica Institute, 2007, pp. 31—101.

③ 陳致：《萬舞與庸奏：商代祭祀樂舞與詩經中的頌》，《中華文史論叢》2008年第4期，上海古籍出版社，頁46。

時學者或以爲是金文引用詩句，但實際上，並非引詩，而是金文和詩經都在用當時成語，如“以雅(夏)以南”、“日就月將”、“旻(日、啟)天疾威(畏)”、“出入(內、納)王命”、“不敢怠(迨)荒(遑)”(或曰“不敢妄【荒】寧”)、“夙夜匪(筐、不)解”、“式宴(匱)以衍(侃)”等，率此類也。^①這些成語實際也是在周人早期宗教活動中逐漸形成的。《詩·周頌》諸篇在使用祭祀成語的過程中，也是句式逐漸變得規則，向四言形式發展，同時又有一種入韻化的傾向，而這種入韻的傾向，又與金文銘辭，特別是編鐘銘文逐漸變得規則，並且入韻，幾乎可以說是同步的。也就是說，大約都是在西周中期共王(922—900 B.C.)時期以後，《周頌》詩篇中的許多成詞或套語的運用，與西周銅器銘文上綴辭是相同的。《周頌》中有些詩如《清廟》、《維天之命》、《維清》、《烈文》、《天作》、《昊天有成命》、《我將》、《時邁》、《思文》、《豐年》、《訪落》、《敬之》、《小毖》、《酌》、《桓》、《賁》等篇中都偶有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的句式，合金文銘辭而參之，則兩者都是當時宗教活動中常用語詞，而這些語詞在西周中期以後也逐漸開始由雜言向四言化發展，並且定格爲成語。

在詩經各部分中，《周頌》有一個異於《詩經》其他部分的顯著特點就是其中很多詩都不入韻。據王力的擬音，全篇基本上無韻的詩有《清廟》、《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時邁》、《臣工》、《噫嘻》、《武》、《小毖》、《酌》、《桓》、《般》等。^②其中《昊天有成命》、《時邁》、《武》、《酌》、《桓》、《般》至少其中數篇極有可能是周初創製的《大武》樂章的歌詞。^③王國維曾解釋說其詩不入韻是因爲《周頌》的聲調較緩。這個解釋是不盡如人意的。以西周金文與《周頌》諸詩比讀，我們發現西周金文大約也是在共王時期開始向韻文方向演變，而且在宣王時期更是出現了一種普遍入韻的傾向。其中《周頌》與金文中某些成語正是在韻文發展的過程中，爲了入韻而生成的。比如西周中晚期常見的“永保用享”、“用享用孝”、“萬壽無疆”、“眉壽無期”這一類的成語，是從早期的“永保用”、“用享”、“用孝”、“無疆”、“眉壽”等詞變化而來。之所以出現這些四字語詞，也是由於西周中晚期金文中，多以陽、幽、之部爲韻。

① 本人在幾處討論金文中成語非引詩的問題，參見拙文《說南：再論詩經的分類》，《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12卷(1998年3月)，頁373—375；《詩經與金文中成語(一)》，始發表於2009年1月17日香港中文大學主辦之《古道照顏色：先秦兩漢古籍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刊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頁：http://www.guwenzi.com/Show.asp?Src_ID=373。

② 王力：《詩經韻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390—401。

③ 我認《大武》樂章實際經過了兩次創製的過程，第一次是在武王(1046—1043 B.C.)滅商之前，第二次是在周公平定三監及淮夷之叛之後。詳見Chen Zhi, *From Ritualization to secularization: The shaping of the Book of Songs*, Sankt Augustin: Monumenta Sinica Institute, 2007, pp. 165—173。

如果從考古發現的樂鐘來看,《周頌》與金文四言成語的大量出現,以及兩者由無韻到雜韻,到有韻的過程,二者近乎同步的發展,這些並非歷史的偶合。四言詩句的定型,以及入不入韻實際上是與西周樂鐘的使用,以及音樂的發展有很大的關係。西周禮樂中最重要的樂器編甬鐘,在西周穆王(976—922 B. C.)時期以後才出現了《周禮》中所描述八件一組、與編磬和鐃共同使用的範式。也是穆王(976—922 B. C.)時期以後才真正使用樂鐘正、側鼓雙音構成四聲音階的旋律效果,青銅器銘文特別是鐘鐃銘文上長篇韻文的出現恰恰是在這個時候。如此同步,絕非偶然。考察《詩·周頌》諸篇與西周金文在成語和習語的使用,以及同步發展的現象,我們可以從一個側面揭示出,在西周中期,伴隨着音樂的使用和祭祀禮辭的發展,中國的四言體詩開始逐漸形成,並且格式化。

下面讓我們來具體討論一下《周頌》與金文中所用的成語,韻文及四言詩體的形成。

一、《詩·周頌·清廟》及《周頌》其他諸篇所見金文中成語

《詩經·周頌》諸篇與金文比照來看,《詩經》中成語的運用,可謂隨處可見。今以《詩·周頌·清廟》為例,稍覘詩與西周早期金文之關係,可以看出其源出為一,都是周人的宗教禮儀活動中,所歌所誦的禮讚之辭。其辭的內容是:

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

這些禮讚之詞,與西周銅器銘文中所保留的語詞頗多相似之處,如果我們注意一下詩中我所標示的部分,這些事實上都是金文中最為常見的詞語,前人或稱為“成語”,如王國維、屈萬里、劉節等;或稱為“成詞”,如姜昆武等;今人或稱“習語”。^①但不管如何稱名,應該說明的是這些語詞都是金文和兩周文獻中常見的固定化的表達方式,或者為當時成語的一部分,或者為某一成語的變化形式。下面讓我們具體分析這些詞語與金文辭例之關係,及其在周人宗廟祭祀活動中的作用。

於穆清廟

“於穆”一詞,金文中未見。而金文與《詩經》中“穆穆”一詞當是“於穆”之本義。

① 韓巍:《單述諸器銘文習語的時代特點和斷代意義》,《南開學報》,2008年第6期,頁26—33。

《清廟》的下一首詩《維天之命》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金文中較常見的是以“穆穆”來狀文王或祖考先王之德，故金文中常見的表達方式是“穆穆”與“不顯”、“明德”相並舉。春秋邾公鉉鐘邾公華（集成 245）鐘銘文“余畢葬威忌（𠄎），𠄎（怒）穆不彖（墜）于厥身。”“於穆不已”猶言“怒穆不彖”。金文中多言“穆穆”，並與“虞虞”、“不顯”、“皇且考”、“明德”等相並言，詳見下“秉文之德”條。

肅雍

《周頌·離》：“有來離離，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周頌·有瞽》：“肅離和鳴，先祖是聽。”《召南·何彼禕矣》：“曷不肅離，王姬之車。”《大雅·思齊》：“雍雍在宮，肅肅在廟。”這些當與“肅雍顯相”一句合參之。《周頌·有瞽》：“肅離和鳴，先祖是聽。”一詩，《禮記·樂記》云：“詩云：‘雍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何，何事不行？”可知“肅雍”即“肅離”，並且是“肅肅雍雍”或者“肅肅離離”之簡略語。此語金文中亦多見。如宗周鐘（集成 260）銘文云：“倉倉𠄎（息恩）。𠄎（從者從佳）離離。用卽各不顯且考先王。”從者從佳之字，學者或云爲“錯”字，或以爲“缺”字，說各不同。以𠄎字及錯字字形來看，其與金文中肅字之異主要在肅（𠄎）字下半從𠄎形。上半“聿”形與“錯”字之“者”形有幾分相近。第不知肅離（雍）是否即是金文中“錯離（雍）”之譌變？鄭剛認爲，此“者”形爲“𠄎”字，即“叔”，通“肅”字。^①集成 10285 著錄的訓匜，有“𠄎”字，其形的確與鐘鐃銘文中的“者”旁相近。𠄎字古音在覺部書紐，當與“寂”相同，與覺部心紐之“肅”字是可假借爲用的。王輝云：

繡（幽心）、蕭（幽心）讀爲“寂”（覺從），幽覺陰入對轉，心從旁紐。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道經》：“有物昆成，先天地生。繡呵繆呵，獨立”。乙本“繡”作“蕭”。通行本作：“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②

故金文中之“𠄎𠄎離離”有可能即文獻中之“肅肅雍雍”。金文中從者從佳之字與“錯”字，疑即詩經中肅字之本字。春秋時期簋弔之仲子平鐘銘云：“錯錯離離，聞于夏東。”與宗周鐘一樣，也是用同一成語形容鐘鼓和鳴之聲。此詞又見於春秋時期之秦公鐘（集成 263、266、267、268、269）鐃銘文。曰：“𠄎音錯錯離離，以匱皇公，

① 鄭剛：《古文字資料所見疊詞研究》，《中山大學學報》，1996 年第 3 期，頁 113。

② 王輝：《古文字通假釋例》，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頁 376。